

拖延改革不是出路

□周其仁

不久前我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吗?中国这个要改革的体制,从1952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到1978年,总共也不过就是26年。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换句话说,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可是要改这套体制呢?从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经35年了,人们还在呼吁改革、讨论改革、建言改革。这么一个现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为什么我们过去形成的那套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现在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壮大了。现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亿、多少亿实实在在的利益的。既得利益很大、很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

但是,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一套体制就是一个既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一定



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就退出比赛,总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所以要问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显得特别严重?

我的看法,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是出现过一些大公司,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完全靠“看得见之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那还是要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谁能随便改一改呢?明明

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义”的大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才特别顽强,特别难触动。推进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也就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坚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也要根据实践效果来调整。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改

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现在论改革,还不是摆开架势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的问题。我写过“接着石头过河”,就是挑战一个接一个地飞过来,逼你出手招架。这是第一层次。

第二个层次,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

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就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解放后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

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放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放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

看到这类现象,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人有法不依,没有遵纪守法的好习惯。但有的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的法,定得不合理。我举过一个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一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可是前后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可是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就广播说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地让大家开手机得了?这是说,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可依。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

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可能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如何创建你的“真北团队”

□谢祥

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通过一项研究认为,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城市还是农村,人脑认知能力限制个体社交网络的规模。在移动互联网经济时代,这个数字大概是150人,这个数字也被称为著名的“邓巴数”。邓巴还指出,尽管在这个比较稳定的群体中,人类最亲密、频繁交流的人数只有“可怜”的7人。

在现实世界中,下至应急临时决策团队、大型企业决策部门,上至国家政治权力核心,7人往往是团队决策中最有效率的人数。在非正式组织中,小规模团队也能成为个人成长和领导力发展的最佳平台,《真北》一书的作者比尔·乔治把这种团队称为“真北团队”。

比尔·乔治是哈佛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曾担任过美敦力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在他的领导下,美敦力公司的市值从11亿美元增长到60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35%。比尔·乔治还是最佳商业书《真北:125位全球顶尖领袖的领导力告白》的作者之一。除此之外,他还著有《真诚领导力》、《找到你的真北》、《卓越领导的七项修炼》三本书。

最近出版的《真北团队》继承了比尔·乔治首创的真北理念,然后从领导力方面向团队建设方面发展。在这本书中,作者先提出“真北团队”的定义:真北团队是由6~8人组成,成员定期会面,共

■ 新书快递

信号与噪声：大数据时代预测的科学和艺术



作者:(美)纳特·西尔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信号与噪声》中涉及如下有趣又值得研究的问题:天气预报说降水概率为60%,你出门会带伞吗?被雷电击中的概率到底有多大?地震发生之前,我们真的无法预测吗?中情局为什么会忽略“9·11”恐怖袭击发生的信号?禽流感为何会突然爆发,又突然消失?为什么大数据时代的预测更容易失败?

“信号”是我们想要和需要的事实。“噪声”则是另一回事,通常是不相干的信息,它阻碍或误导我们搜索“信号”。

人类每时每刻都需要对未来进行预测并制定相应的策略,如此国家、企业乃至个体才能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对于“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倍加关注。

在信息爆炸的大数据时代,随着我们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我们所要做出的预测的速度

和数量都在不断增加。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实世界中的很多预测都失败了,由此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9·11”恐怖袭击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卡特里娜飓风、2011年日本大地震、禽流感肆虐,这些“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糟糕的预测,也就是说预测者们被众多信息中的“噪声”干扰,而忽视了其中真正的“信号”。

作者作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预测专家之一,检视了从飓风到地震、从经济到股市、从NBA到政治选举在内的众多领域的预测事例,旨在回答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从繁杂的海量数据中筛选出真正的“信号”,摒弃“噪声”的干扰,从而作出接近真相的预测。

真正优秀的预测者会用概率的方法思考问题,他们谦虚而且勤恳,他们能清楚地区分什么是不可预测的、什么是可预测的,他们注重能带领他们接近真相的成千上百个细节,他们能辨识出什么是“噪声”,什么是“信号”。

从全球经济的健康到战胜恐怖主义,都依靠预测的质量。《信号与噪声》可以给你想要的答案。

作者简介:纳特·西尔弗,统计学家、作家和《纽约时报》政治性网站538.com的创始人。2008年美国大选期间他成功预测出49个州的选举结果,2012年大选期间更是成功预测出全部50个州的选举结果,被称为“神奇小子”。2009年,《时代》周刊将他评选为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中国新趋势



作者:韩秀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未来十年中国将会变成什么样?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拉动?哪些行业将获得大发展的机遇?如何改变中国人对未来的预期?在经济学家韩秀云的新书《中国新趋势》中,上述热点问题都得以解读。

作者简要剖析和总结了2008年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的

□周鸿祎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头驴,背着两捆草,饿了。可是,到底放下哪一捆来吃呢?驴一直犹豫不决,结果饿死了。这个故事有些夸张,但人生很多路口,大家都会在路上口上徘徊。选择是很难很痛苦的,这边有诱惑,那边也有诱惑。到底选择哪个?我的同学都出国了,我是不是也应该去新东方学习准备考托福?我的发小公务员了,我是不是也要买书复习了?电视上说有个人小学没毕业做电商就发财了,我是不是也要到淘宝上开个店铺?

你今天听到东边热闹往东跑,明天听到西边热闹就掉头往西边跑。很多年下来,你就会变成一个没头苍蝇,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疲于奔命,没有积累。

我认为,如果你觉得自己还年轻,那一定要花点儿时间想一想,不说了了,就是未来10~15年时间,你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未来10~15年,你到底最想获得什么?这是最重要的。这个东西,你可以说是梦想,也可以说是价值观。

为什么?因为一旦想清楚



了,以后你无论作什么判断,作什么选择,就都简单多了。有助于实现我梦想的,我就干;没帮助,我就放弃。把梦想锚定,短期内不管你遇到什么诱惑,遭遇什么困难,都不会左右你的判断和选择。

在这点上,我很幸运,在困难面前我很少摇摆,经常是一拍脑袋就作决定了。因为我上高中的

时候,就想清楚了我这辈子要干什么。我不想到一个仰人鼻息的单位去,我就梦想着要开个自己的电脑公司编软件,自己安排生活和命运,而且做好了,很多人都用,这样很有成就感。一旦有了这个想法,所有的选择都变得非常简单。

你如果说,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年薪50万元。对这样的目标,

我的建议是,目标不能太物质化。太短期、太物质化的目标不能内化成你的梦想。像年薪50万、100万元这样的目标,你可能很快就实现了,然后就失去了梦想,没了目标,跟有些拿到巨额拆迁款的人一样,沉溺于赌博,把自己的未来都毁了。或者有的物质化目标很难实现,比如你想成为中国首富,可能你很快就放弃了。我认为,只有这种非利益化的梦想和目标,才能长期激励一个人不断地去追求。

我大学毕业时,也面临着选择。到底是去南方的某家银行工作,拿一月3000元的高薪,还是去北京的一家大型电脑公司,拿一月800元的工资?我没犹豫什么就选择了后者,因为只有到电脑公司,才能学习怎么做软件,才有机会实现我的梦想。

后来我离开这家电脑公司到互联网里去创业,有很多人对你说:“你太有勇气了,放弃了高薪和职位。”但是我觉得这不需要什么勇气。它已经不适合我了,没法帮助我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些别人认为很珍贵的东西,对我来说是nothing(什么都不是)。所以,你的梦想和目标不跟物质挂钩,物质

选址 打造成功商业的关键

年度报告一塌糊涂,财务经理定会被告;公司在法庭上败诉,辩护律师职位不保;产品质量低下,生产经理立即下台;新产品卖不出去,销售经理或宣传经理可能要另谋其职。然而,当建厂新址被证明是错误的地址时,又应由谁来承受谴责?公司董事长或全体董事会成员会为此负责,但他们中谁也不会因此而被革职。

以下这则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即将到退休的年纪。为了庆祝结婚40周年纪念日,他和他的夫人打算用一个月时间环游世界,但更为重要的是,他需要在欧洲新设一家生产基地。

5月初,这对夫妇抵达了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当天天气极佳,又恰逢“圣伊西德罗(马德里的守护神)节”,所以那个星期他基本没做什么工作。斗牛比赛精彩刺激,观众热血沸腾,董事长夫人立即爱上了这座城市。公司驻马德里的代表是位能人,熟知马德里所有一流的酒店和这座

城市的特色之处。他带领这对夫妇观赏了弗拉曼科舞蹈表演和斗牛比赛,又到一家著名的海鲜酒店享用大餐。在谈话中,大家提到了在欧洲建厂的问题。董事长夫人向丈夫建议道:“为什么不建在马德里呢?”

这位董事长事后告诉我,从他夫人提出那个问题的一刻起,所有事情都进展得太快了。这位驻西班牙的当地代表恰好有一个从事房地产的兄弟,而他的这位兄弟找到了一个适合建厂的地方。他的另一个兄弟短时间内就拿出了设计图纸并办好了建筑许可证。这位代表还有一个当公证人的表兄弟,由他来处理地契手续。他还有一个朋友,是马德里顶级的商业律师,可以提供法律咨询。最后,他最好的朋友经营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能够且愿意帮助公司避税。

选址决策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运输成本。事实上对这个项目而言,所有的原材料首先被海运至巴塞罗那港,然后再用卡车运到马德里,运输距离

长达600公里,而公路状况糟糕、狭窄且蜿蜒曲折。当时两个城市之间还没有高速公路。此外,马德里地区仅能提供产品不到5%的市场,而另外的95%只能运返巴塞罗那,继而再运送到其他欧洲市场。

工厂已经建好并持续运营,但是巨大的亏损持续了数年之久。正当我们调查这个项目进展情况的时候,却发现这家工厂被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客户。此后不久,当初做出决策的董事长旋即退休,并没有谁为错误选址的决策受到责难。如果错误判断了成本因素,或者那些不可见的因素恰恰造成了负面影响,选址的确可以破坏任何一种经营活动。

因此,本书不会对夫妻之间(选址地域与投资者之间)“婚姻”问题中的某一方拿出来单独看待,而要从整体上来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双方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美满的婚姻将不会被海运至巴塞罗那港,然后再用卡车运到马德里,运输距离

有“千里眼”用以洞察万物,但仍然努力对影响未来“选址、选址,还是选址”问题的主要因素做出预判。

作为行使独立功能的设施规划师是一个较新的概念,这一概念起始于40年前。设施规划师可以是工料测量师、建筑师、土木工程师和地产专业人士等。设施规划师的职责常常集多种功能于一身,原因在于经济衰退时期选址决策的使用频率和需求相当低,甚至根本就不存在。

那些大型的、急速扩张的公司成立了特殊的团队行使使命。团队由各种专业人士组成,其中包括负责并购的管理团队和通常被称作“工业地产”方面的专家。

选址决策的准备工作极其复杂,需要在众多不同项目、公司管理方式、公司政策、瞬息万变的投资环境、迅速发展的经济现实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做事风格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同时,还需要识别影响投资项目的许多不可见因素。